

中國近代文學評林

第3輯

華南師範大學

近代文學研究室

廣州文化出版社

5

责任编辑：李树政

封面设计：黄丽雅

封面题字：何绍甲

3/5
中国近代文学评林

（第三辑）

华南师范大学近代文学研究室 编

广州文化出版社 出版
发行

（广州市环市中路200号4楼）

广东连县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 11.625印张 25.6万字

1988年1月第1版 1988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册

ISBN 7—4531—0095—9/1·40

定价：2.85元

目 录

论中国近代文学的过渡性特点·····	管 林 (1)
中国近代文学分期问题的思考·····	钟贤培 (17)
试论近代文学审美观念和思维方式的演变·····	陈永标 (25)
更搜欧亚造新声	
——中国近代文学走向世界浅论·····	沈善庭 (40)
中国近代中西文学比较方法论略·····	陈永标 (52)
论鸦片战争时期诗歌的发展变化·····	钟贤培 (67)
中国近代小说理论的时代格局和理论的深化·····	钟贤培 (82)
试论二十世纪初期我国小说中的丑病形象	
——兼及谴责小说和鲁迅小说的比较·····	陈 方 (98)
近代资产阶级文学革新运动纵横谈 ·····	汪松涛 (111)
戊戌前后时期诗坛名人谱 ·····	谢飘云 (128)
亚子先生今不朽 诗文湖海同长久	
——论柳亚子在中国文学史上的贡献·····	管 林 (154)
柳亚子与秋瑾诗词创作比较·····	谢飘云 (175)
从《老残游记》看刘鹗的创作心态·····	钟贤培 (191)
论魏源的文学思想·····	管 林 (199)
梁启超艺术心理学刍论·····	刘伟林 (208)
注重个性和艺术特征的论评	
——浅论梁启超的《屈原研究》·····	陈永标 (218)

阐释的偏差及其思考

——谈《戒浮文巧言论》的评价……左朋军 (231)

近年来我国近代文学研究述序

……沈善庭 黄炯伟 陈 方 (243)

中国近代文学研究论文索引(1985——1987)

……潘琰如 罗伏茜 陈国初辑 (257)

总论及其他 (257)

作家作品 (264)

龚自珍 (264)

魏 源 (267)

刘熙载 (268)

林则徐 (268)

康有为 (269)

梁启超 (272)

黄遵宪 (273)

丘逢甲 (276)

谭嗣同 (277)

李伯元 (278)

吴趼人 (279)

刘 鹗 (279)

曾 朴 (280)

林 纾 (280)

严 复 (281)

苏曼殊 (282)

章太炎 (283)

邹 容.....	(285)
陈天华.....	(285)
秋 瑾.....	(286)
吴 梅.....	(287)
林觉民.....	(288)
王国维.....	(288)
柳亚子.....	(293)
黄运生.....	(296)
其 他.....	(297)
补 遗.....	(308)
近代短篇小说选刊.....程 筠校点	(312)
小足捐.....陶安化 著	(312)
新聊斋·唐生.....平等阁 著	(316)
女侦探.....冷 著	(320)
诸神大会议.....笑 著	(333)
暗中摸索.....虚 白著	(341)
水深火热.....知新室主人译述	(348)
两头蛇.....张其成 著	(356)
编后记.....	(365)

论中国近代文学的过渡性特点

管 林

近年来关于中国近代文学的断代与性质问题，国内外研究者曾提出不同意见，其中主要有如下四种：

第一种意见认为，中国近代文学的范围，从鸦片战争时期划至“五四”运动时期。

第二种意见认为，中国近代文学，应包括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诞生之前这一百余年的文学。

第三种意见认为，从文学实际出发，中国的近代文学，应从戊戌变法时期开始，延伸到“五四”运动之后。

第四种意见认为，中国近代文学的范围，应包括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这一百年的文学。

上述意见的分歧，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我认为，中国近代文学本身所呈现的过渡性特点，恐怕也是出现上述分歧意见的要重原因。

对中国近代文学的断代问题，学术界的讨论必将继续下去。在学术界对此问题还未取得统一意见之前，本文拟采用建国后编写的多数中国文学史著作的意见：所谓“中国近代文学”，即指鸦片战争到“五四”文学革命前这一阶段的文学。

中国近代文学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终结，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准备，无论从文学创作的发展趋势，思想内容和形式方面的变化，还是从文学思想的新旧交替，作家队伍

的错综复杂诸方面，都产生了许多既不同于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学，又不同于“五四”以后新文学的特点。例如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是这一历史时期文学思想的主流；文学题材的广泛性和文学体裁的多样性；作家作品的复杂性；由旧文学向新文学转变的过渡性，等等。这些特点，都有待于中国近代文学研究者去进一步探讨。本文拟就关于中国近代文学的过渡性特点，以及这些特点形成的原因，发表一些看法。

首先，从中国近代文学的发展变化来看，它的过渡性特点则表现为：新旧交替，承前启后。

我国的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即鸦片战争时期和太平天国革命时期。这一时期，英国殖民主义者的炮火，打开了闭关自守的封建帝国的大门。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加速了农村经济的破产，加深了阶级矛盾，因而激发了太平天国革命；同时也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生长和发展。在新的矛盾的基础上，统治阶级内部发生了分化，一部分比较开明的学者文人，发出了改良内政，学习外国有用知识，抵抗外国侵略的呼声。正是由于新的经济因素、思想意识的产生和发展，传统文学的陈腐局面开始有所突破，进步的文学潮流在逐步形成。龚自珍、魏源等人的诗文，太平天国革命领袖前期的诗文，以及优秀的民间文学作品，形成了这一时期进步的文学潮流。同时，传统诗文也出现了宋诗运动和“桐城派”的古文“中兴”。古典小说陡然衰落，除了个别作品外，许多狭邪小说和侠义小说充满了封建糟粕。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至二十世纪初，这个时期，是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买办阶级互相勾结，把中国变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时期，也是中国资本主义开始有了初步发展的时期。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达到空前的紧张阶段。既有封建买

办阶级的卖国投降，也有中国人民强烈的反帝爱国运动——义和团运动。同时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形成了相当广泛的政治和文化运动。由于改良运动的需要，在文学领域内也发生了各种改良的呼声，如“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的提出。西方资产阶级阶的社会科学和文学的不断输入。黄遵宪和梁启超等的诗文，密切配合改良运动产生了“新派诗”和“新文体”。小说出现新的繁盛局面，不少作品成为改良社会、揭露社会政治黑暗的有力工具。以“皮黄”为主要腔调的“京剧”代替了昆剧。个别作家虽然也利用杂剧、传奇反映新的时代内容，有一定意义，但成就不大。这一时期，改良运动对封建文化发起了猛烈的冲击，然而，由于中国资产阶级本身的软弱性，其冲击的力量是有限的，因而传统诗文的余波并未平息。诗歌方面出现了以陈三文为代表的“同光体”和其他拟古诗派。文章方面，不仅有“桐城派”、还有为桐城派古文或传统古文找到新内容的严复、林纾的翻译文。

二十世纪初至“五四”运动前夕，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伟大胜利又转为失败的时期。由于进步的文学潮流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诗歌、散文、小说、戏剧，以及某些民间文学形式，都成为革命斗争的工具。以“南社”为中心的革命诗歌大量地涌现。散文方面，既有章太炎取法魏晋的古文，也出现了白话文。小说有新的发展，也有愈趋下流的东西。戏曲方面开展了改良、革新运动，并产生了话剧。在革命潮流中，一切腐朽文学受到沉重的打击，但它们还远远没有被打垮，“同光体”诗人依然活跃于文坛。随着民主革命的失败，封建势力的复辟，一度倾向革命的进步作家，有的颓唐悲观，有的甚至走向反动。前一时期的改良派

人物，也与封建遗老们拉起手来反对革命。中国资产阶级由于先天的软弱性和革命的不彻底性，不可能完成民主革命和彻底打倒封建文学的任务。这个历史任务，不得不落到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肩上。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几个时期的近代文学都是新旧并存的。新旧文学因素的比重，虽然不同时期和不同体裁的文学各有不同，但从总的趋势来看，近代文学的新因素是两头小中间大的。它好象一座两头低中间高的拱桥，将中国古代文学与中国近代文学连接起来。它继承了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民主性，产生了近代反帝反封建的文学。虽然近代文学发展的结局，并没有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贯彻到底，但它却开了“五四”新文学反帝反封建的先河。就文化思想而言，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所以发生，乃是苏联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近代文化反帝反封建的传统思想相结合的结果。中国近代文学既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建声和终结，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前奏和开端。

其次，从中国近代文学的创作方面来看，它的过渡性特点则表现为：新旧共处，文白并存。

在思想内容方面，维护封建统治的文学与反帝反封建的文学并存。这一时期，封建主义的文学虽已衰落，成为强弩之末，但尚未消灭，仍在苟延残喘，继续挣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学虽已萌兴，但还比较软弱，并未建康成长。在诗歌、散文、小说等方面，都存在着为封建主义服务的反动文学和充满战斗精神的反帝反封建的进步文学的对立。在诗歌方面，既有封建地主阶级的仿古诗，还有以新事物、新意境为内容的新派诗，还有适应新兴资产阶级需要的翻译诗。在散文方面，既产生了以曾国藩、张裕钊、黎庶昌、薛福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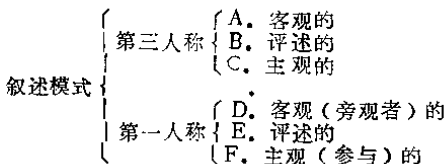
吴汝纶为代表的“中兴”的“桐城派”古文，即湘乡派古文，也出现了适应维新变革需要，“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①的“新文体”，小说方面的思想内容，大至也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反映封建地主阶级思想的，另一类是反映软弱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与“革命”的。第一类如俞万春的《荡寇志》，又名《结水浒传》，“使山泊首领，非死即诛”，维护封建思想是很明显的。又如文康的《儿女英雄传》，维护封建思想，宣扬封建道德，也是显然的。第二类小说的作者的 attitude 或世界观，并不一定是资产阶级的，但是它们的客观效果，是暴露了现实，有利于改良和革命；作者的思想无形之中也多少受了一些资本主义文化思想的影响。这类小说中比较好的，就是鲁迅先生所称述的四部“谴责小说”。

在表现手法方面，这一时期的创作，除了继承古代文学的传统手法外，也吸收了外国文学的表现手法。以诗歌为例，中国近代诗歌的变革受西方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从艺术表现手法上说，浪漫主义崇个性、重抒发的艺术主张，启发着近代诗人去追求自己时代的艺术风格。首先，在感情的表达上，不再象古典诗人那样强调“止乎礼义”的节制，而是更接近于西方浪漫主义诗人那样，彻底打开感情的闸门，任其自由奔腾，在他们的笔下，反抗挑战的怒吼与长歌当哭的悲愤，代替了“怨而不怒”的温柔敦厚。“以杀报杀未为过，复九世仇公义昭。”（高旭《海上大风潮起作歌》）“饮刃匆匆别鉴湖，秋风秋雨血模糊。”（柳亚子《吊鉴湖秋女士》）“要从棘地荆天里，还我金刚不坏身。”（周实《感事》）这里有痛快淋漓的怒骂，有热血飞扬的激动，有艰苦奋斗的决心。这种冲破拘束的感情与表达方式，

明显地有异于古典诗歌的节制。其次，是形象的刷新。如果说重主观、崇个性是浪漫主义文学的特点，那么在近代诗歌中，首先是抒情主人公形象的解放。再次是诗歌形体上的变革。总的来说，近代诗人还只是简单地使用了古典诗歌的五、七言古诗，律诗和绝句等传统形式。在诗歌形体上虽然没有很大的突变，但也发生了新的变化。例如古风体的复兴，诗体的自由化。梁启超的《去国行》、《志未酬》，秋瑾的《宝刀歌》、《宝剑歌》，高旭的《海上大风潮起作歌》、《登富士山放歌》等等，都是这类作品。它比起前人的作品来，更着意于突破拘束，更富于句式、声韵上的变化②。再看小说方面，由于受翻译小说的熏陶，已触及对科学技术的描写，开始接受世界现代物质文明的成果。在中国小说陈旧古老的躯体中，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如吴趼人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对电镀就作了相当细微的描写，并且介绍了电镀工艺；在他的《新石头记》中，还介绍了生物学的知识、机械原理等。不仅如此，近代小说的作者们，还把眼光从《儒林外史》等转向西洋小说，开始学习西洋小说的作法，如倒叙法、插叙法、补叙法，第一人称叙述法以及不同于中国小说的人物外貌，人物心理，自然环境的描写法等等。把中国传统小说技法打破了。如吴趼人的《九命奇冤》，内容叙述雍正年间，广东番禺县梁、凌两家亲戚，因“风水”问题，受坏人的挑拨，以致渐成仇敌，并造成九命奇冤。最后以梁家上京告状，朝廷派钦差前往查办，才使沉冤得以昭雪作结。《九命奇冤》虽仍属章回体小说，但在结构布局、人物描写等方面，都吸取了外国小说的技法。如本书的布局，先叙强盗纵火烧死梁家八口，然后追叙原委。待追叙原委完毕，到第十七回“闻凶耗梁天来气死，破石室黄知县验尸”，又接着第一

回发生的事，直叙下去直至冤案了结为止。这种结构布局的方法，在我国古代小说中是罕见的。《九命奇冤》是根据安和的《警富新书》改编而成的，将二者的结尾作一比较，也可以看到近代小说摆脱古代小说技法的一个侧面。此外，近代小说与古代小说在手法上的不同，还表现在叙述模式方面。

小说的叙述模式，一般可分为两类六种：



近代小说，则不再象传统小说一样了，它同时包容了A、B、F这三种叙述模式。这些叙述模式的并存，是对古典传统小说技法的很重要的突破。

在文学体裁方面，旧体裁仍在发挥作用，新体裁也在陆续出现。在诗歌方面，近体诗、古诗、民歌诸形式仍在广泛被采用，同时新派诗、译诗也应运面生。在散文方面，文言散文仍被广泛运用，新文体（或称报章体）也风靡一时，而白话散文也有不少报刊在提倡。在小说方面，可说是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并存，传统小说与翻译小说并举。在戏剧方面，传统的杂剧、传奇虽然仍有人在写，但影响不大，绝大部分剧本都成为名副其实的“案头剧”。形成了乾隆年间的京剧，具有唱词、说白通俗易懂，唱腔变化也比较灵活的特点，受到当时人民群众的欢迎。与此同时，象川剧、粤剧等地方戏也进行了某些改良，受到当地群众的欢迎。由于时装新戏的发展，加上外国戏剧的影响，终于在本世纪初，产生了放下

锣鼓，丢开了唱腔，摆脱旧剧姿态，跳出旧剧圈套的话剧。这种形式新颖，通俗易懂的早期话剧，为“五四”以后的话剧运动开辟了道路。

在语言运用方面，可说是文言、白话并存。这一时期除继续使用文言来表现作品的思想内容外，还有“笔锋带感情”的“报章体”语言。《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孽海花》等小说，不仅是用白话写的，而且还大胆地采用了方言。加之它们用现实手法描写当时社会的情况，使它们与“五四”白话文学结下了最亲近的血缘，成为“五四”白话小说的先驱。

再次，从近代文学思想方面来看，它的过渡性特点则表现为：抱残守缺与观念更新同在。

中国近代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的斗争，也反映在文艺思想领域内，形成了不少代表各种社会势力的文艺派别。一类是代表封建旧文化的派别，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桐城派和宋诗派。它们为了维护封建统治，保住自己在文坛上的“正统”地位，就大力宣扬封建“道统”和“文统”，在文坛上筑起一道与现实生活隔绝的围墙，给诗文创作设置了许多清规戒律。他们只许作家阐经释道，不许反映新的现实，表达新的思想；提倡摹拟古人，反对新的艺术创造；对新的文艺思想，竭力加以围攻和扼杀。另一类是反映资本主义要求的文艺派别，如改良派、民主革命派，它们对封建文艺派别进行猛烈的冲击，大力宣传自己的文艺理论主张，要求突破封建“道统”、“文统”对文艺的束缚，主张文艺面向现实，表现新的现实，新的思想，以开启民智，为资产阶级服务。在鸦片战争时期，出现了龚自珍、魏源等人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改革派，他们要求改革现状，希望为日趋没落的封建社会找出

一条生路。在文艺思想上，他们主变敢逆，以求解脱封建“道统”和“文统”加给诗文的束缚；提倡经世致用，以使诗文与现实相结合；强调自抒胸臆，以利于诗文表现个性。他们是近代进步文艺思想家的前驱，对后世起着启蒙作用。在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在文化领域，对封建主义进行了激烈的大扫荡；在文艺思想上，也较为激进，提出了除邪留正，革故鼎新，重实用，反浮文的主张，与封建文学观形成了鲜明的对立。到了维新变法时期，新兴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活跃在历史舞台上，其政治立场与太平天国不同。他们反对革命，主张改良，以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建立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作为追求的目标。在文艺思想上，他们接受西方的资产阶级观点来观察和论述文艺问题。重视文艺感染群众的威力，大力提倡小说、戏曲等通俗文艺，夸大文艺的社会功能，企图利用文艺作为改革社会的主要手段。由于以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和自然科学学说为理论武器，来论述问题，批判封建的文艺观，就使这种论述和批判有了新的立砵内新的，容。随着戊戌变法流产，资产阶级革命应时而起。他们以反清革命，抵抗外侮，建立民主共和国作为政治纲领。在文艺思想上，也因此而特别重视文人的气节，宣传汉族文化的光荣传统，大力提倡能通俗地宣传种族革命思想的戏曲，崇尚能抒发革命理想的浪漫主义。总之，近代文学观念的更新，前期是缓慢的，是古代文学思想的延伸期，在“情”与“理”的矛盾中，出现了新的抗争；中期是剧变的，是新旧文学思想的交替期，以程朱理学为指导的旧文学思想日暮途穷，以资产阶级思想为指导的新文学思想脱胎而出，锋芒毕露；后期则是有所反复的，是资产阶级文学思想的盛衰期，改良派进一步接受资本主义文化影响，发动一连串的文学“革命”，革

命派受到种族主义的束缚，文学思想上的保守多于前进。

最后，从近代作家队伍来看，它的过渡性特点则表现为：矛盾复杂，业余与专业并存。

由于近代是一个急剧动荡的社会变革时期，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斗争异常激烈，而且错综复杂，新旧思潮回环交错，不仅一个派别，即使是一个作家身上或一部分作品当中，都出现了十分复杂、矛盾的情况。例如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政治家中与文学关系最密切的梁启超。他作为资产阶级的改良派，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政治上一直走着堕落的道路。但作为资产阶级的著名学者，学术上的巨大成就却大都是晚年做出的。作为一个改良主义者，他有时同洋务派、顽固派沆瀣一气，但更多的时候还保持自己独特的色彩。他不敢坚决地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在对外政策上主张妥协、忍让，但在他身上始终没有销尽爱国热情。在辛亥革命前，他歌颂清王朝的深仁厚泽，鼓吹保皇，同时又无情地揭露晚清政治的黑暗和腐朽，客观上告诉人们革命势在必行。在学术上，他一方面提倡“为学术而学术”的纯客观研究，另一方面又主张学术要“药现代时弊”。在不少具体学术问题上，他留下了十分精湛的见解。戊戌变法前后，他帮助康有为，政治上对封建顽固派进行激烈的斗争，思想上对“天不变道亦不变”的顽固守旧理论进行了勇敢的冲击。在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中，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戊戌政变后，他流亡日本期间，除大胆地揭露清王朝的黑暗和腐朽，继续宣传维新变法理论外，还大量输入资产阶级的各种流派的学术思想，对中国民主主义思潮的传播在客观上起了促进作用。他还大力提倡“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使中国近代文学以新的思想、新的意境、新的形式开出了绚丽的花朵。他

带头进行文体的改革，以满含感情的笔触，热情奔放的语言，舒展自如的形式，写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篇章。这些文章，即使当他在政治上堕落成保皇党之后，在青年中仍受到欢迎。从邵飘萍到张季鸾，从邹韬奋到郭沫若，从陈独秀到毛泽东，他们在青少年时代，无不有过一段崇拜梁启超的时期。一九〇三年的鲁迅，还是梁启超文章的热心读者。郭沫若回忆他在辛亥革命前几年所受到的文化影响时，也断言，当时的青少年“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③。再如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宣传家和理论家的代表人物章太炎，政治上主张革命，在文体上却是主张复古的保守派。他崇尚先秦和魏晋之文，并推为极则。他几乎完全否定了唐宋以后的诗歌发展，认为韵语代益凌迟，一代不如一代，“唐以后诗，但参考史事存之可也，其语则不足诵”，“古诗断自简文以上”④，连杜甫、王维、白居易、韩愈等也已不如古人了。辛亥革命时期成立的进步文学团体——南社，其早期成员绝大多数属于新起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阶层。当他们开始踏进文化战线时，曾经表现得朝气蓬勃，很有一点批判勇气和战斗精神。但是，他们大都接受过封建文化的深厚影响，身上保存着不少封建余毒。对复古思潮，他们只打了几个回合，很快就偃旗息鼓，宣告退却，有些人而且成了复古思潮的俘虏。南社成员中，还有部分地主阶级反清派。他们是复古主义思潮的起劲鼓吹者，在某些时间内，某些问题上，他们可以表现出向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转化的趋势，而在另一些时间内，另一些问题上，他们又可以退缩回去。“南社”组织庞大，成员众多，不免鱼龙混杂。在辛亥革命前，它还能为革命做些工作。辛亥革命后，在反袁斗争中，也起过一定的作用，但以后

就衰落了。有的人蜕化变质了，有的人销声匿迹了，有的人则在历次斗争中牺牲了，“南社”活动陷于停顿。在近代文学作家队伍中，和古代文学作家一样，不少人都是从政从学之余才进行文学创作的业余作家，但也出现了象李宝嘉、吴沃尧、苏曼殊、吴趼人、汪笑侬等一批专业作家。开了中国现代文学作家从事专业创作的风气。

中国近代文学上述过渡性特点的形成，并非偶然，是有其多方面的原因的。

第一，由于时代环境的需要。十九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这一时期，日益暴露了它的腐朽和落后，无力抵抗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临近了总崩溃的时刻。中国由封闭式的国度被迫逐步转变成半开放的国度。新的西方文化被有意识地引进，这种引进是多渠道的，对社会的影响也是多层次、多方面的。引进近代科学不仅影响了科技人才，还影响了思想家。许多思想家在接受了新知识之后，自己也很快成了传播者，这就使科学知识起了开化社会风气的作用。当时输入的西方文化超出了旧文化规范的容纳限度，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价值观念，首当其冲地被冲击了，矛盾和混乱出现了。在中国文化战线上，资产阶级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进行了斗争，例如学校与科举之争，新学与旧学之争，西学与中学之争等等。新的文化有一定的冲击力，但仍比较软弱，旧的文化虽走向衰落，但还有相当的力量。加之从政治斗争的角度看，近代也是个新旧交替、风云变幻的历史转折时期，重大的政治事件接踵而至。凡此种种，不仅反映在近代文学创作方面新旧共处、文白并存，在近代文学思想方面，抱残守缺与观念更新同在；而且也促进了近代文学作家队